



马克思主义 文学观与外国文学研究

陈众议 / 主编

马克思主义文学观与外国文学研究

主 编 陈众议

执行主编 吴晓都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文学观与外国文学研究/陈众议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6

(文学论丛)

ISBN 978-7-301-20739-0

I. ①马… II. ①陈… III. ①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研究
②外国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A811.691 ②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18301 号

书 名: 马克思主义文学观与外国文学研究

著作责任者: 陈众议 主编

组稿编辑: 张 冰

责任编辑: 肖凤超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0739-0/I·246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xfc203@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963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2.5 印张 210 千字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前 言

思想的灯塔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为后世留下了一份极为珍贵而丰富的思想遗产，他们的文艺思想就是这份思想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人文学者认真领会，长期研究，奉为指南。马克思主义永远是照亮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灯塔。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创始人对世界文学艺术具有浓厚的兴趣。博览群书的革命导师们非常熟悉世界文艺经典，十分关注他们所处时代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这些伟人不仅在哲学、史学、宗教、政治经济学等人文领域的研究中经常涉及文学艺术问题，而且还常常抽出时间，专门研究和评述当代的文艺创作，与文艺家直接交往和对话。马克思早年创作过抒情诗歌，撰写过专门的文艺论文《论宗教和艺术》。西方人文学界早已公认，马克思是19世纪精通古典文艺的博学之士，他关于古希腊神话、莎士比亚创作和席勒文艺观的论断极为精辟。恩格斯与英国小说家哈根纳斯有关现实主义的经典对话众所周知，而且，恩格斯本人曾经还酝酿创作一个宏大题材的文艺作品；列宁结合20世纪初期俄国革命运动就列夫·托尔斯泰的文学创作专门写了五篇重要评述，这不仅对于理解托尔斯泰思想和艺术的意义颇具启迪意义，而且对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文艺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欧洲古典文学学术研究和与作家的对话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文艺美学体系。

马克思对古希腊神话的评价是至今为止人类对古希腊文明最精彩的最优美的阐释；恩格斯高度概括了意大利大诗人但丁在终结中世纪开启文艺复兴时代的跨时代的引领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巨匠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用诗情画意的镜子反映了法国大革命后整整一个时代；恩格斯承认关于法国社会历史，他从巴尔扎克小说中所得到的要比从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统计学家所掌握的还要多得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从崛起的俄罗斯文学中敏锐地洞见到俄国近代新兴

市场经济的萌芽；在新兴的挪威文学中看欧洲社会主义文学的新发展的新希望。外国经典文学成为他们深入了解世界各国社会、经济、文化历史与现状的重要文献资源和文化参照，科学论述世界文化问题及发展趋势的重要文本依据。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宏观的哲学层面对文学艺术本质进行了科学的定位。他们指出，文艺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由经济基础来决定，同时，艺术的一定繁荣时期又绝不是与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他们同时还发现了“经济与文化艺术发展的不平衡规律”。理解文学艺术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的规律原理是十分重要的。同时它有助于我们克服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在前苏联文艺学史上，曾经就出现过违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庸俗社会学”批评方法。某些苏联文论家甚至简单化教条地用经济成分去划分作家的类型，这当然是错误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应该注意到，这其中还有一些中间环节，比如俄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早就论述过“社会心理”在文艺创作中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经济基础实际上是通过包括“社会心理”在内的诸多中间环节才作用于文学这种诗意的人类意识的。马克思主义有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科学论断对当今的文艺研究仍然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20世纪末21世纪初世界进入了信息高技术时代，文艺的创作方式和传播方式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为经济基础重要决定力量的生产力因素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高科技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对当代文艺的写作形态和传播形式的影响就是一个典型的明证，不容忽视。

的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首先是从哲学反映论和认识论的高度来理解文学艺术的。所以，他们十分看重文艺的真实性的标准。从恩格斯的“典型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列宁的“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的论断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极为重视文艺的真实性标准。而要达到真实性又离不开深入生活。要注意文学反映的内容与时代的真实状况是否吻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待文学艺术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作家世界观影响其创作观，而作家深入生活，尊重生活的真实，又可以纠正座驾世界观的迷误。

重视人民群众与艺术创造的相互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重要内涵。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历来重视人民大众的艺术创造力。列宁在与德国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蔡特金的谈话中指出：“艺术属于人民。它必须深深地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中间。它必须为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从

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愿望方面把他们团结起来并使他们得到提高。它必须唤醒群众中的艺术家并使之发展。”(“列宁印象记”,《列宁论文学和艺术》,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35页)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念。强调文艺家深入民众生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马克思主义文学观与世界各国文学的创作的实践历程和规律是相符合的,是对文艺实践规律的精辟总结和高度概括。俄国诗圣普希金主张作家到集市上去学习俄罗斯语言。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俄罗斯20世纪的文艺理论家巴赫金也从民间文化丰厚的土壤中看到了文学活力的所在。几个世纪的世界文艺创作实践和成就证明,深入民众生活,熟悉民众的思想、情感和语言,的确能够使文学家寻找到艺术灵感和更加丰富的表现手段。

重视人民与艺术的关系,就离不开关注民众的现实生活,因此重视现实主义文学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19世纪以降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浪潮澎湃,佳作迭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是这一文学进程和重要流派兴起的历史见证者。他们身处现实革命的运动中,都特别重视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方法,尤其关注当时现实的社会发展状况,希望进步作家用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唤起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提倡人民大众喜欢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倡文艺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比较起其他流派的文学创作,现实主义具有更加直观的真实性和认识教育功能。因此,真实性成为评价现实主义创作的首要标准。就艺术标准而言,恩格斯认定的“充分的现实主义”,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强调“意识到的历史的内涵”。对历史发展趋向或者趋势的把握,应该是意识到历史内涵的重要的题中之义。他们在评价黑格尔的思想时,说他的体系中贯穿着一条历史主义的红线,其实在马恩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中更是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红线。真正的现实主义创作不是就事论事,不是对人生和社会浮光掠影仅触表层的浅薄描摹,而是一定要深入描写人的灵魂本质,并且充分揭示形成种种性格的社会环境,尽可能透视人物历史运行的前景。它能使我们掌握深刻评析作家思想力度和艺术概括力的主要标准和尺度。恩格斯在评论拉萨尔的历史剧《济金根》时,提出了文艺创作应该遵循的原则:“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根据我对戏剧的这种看法,介绍那时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会提供完全不同的材料使剧本生动起来……”(“恩格斯致拉萨尔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2页)忠实现实、忠实生活本身,同时也尊重艺术创作的规律,才可能催生多彩的艺术成果及其表现形式的多样化,造就文化艺术的大繁荣。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视和喜爱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但是他们并不排斥其他流派的文学艺术创作。马克思一贯提倡的“莎士比亚化”正是尊重艺术创作形式多样化的具体体现。他们对英国积极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和雪莱的高度赞美广为人知。列宁鼓励俄苏现实主义创作,对真实反映现实的又呈现20世纪初现代诗歌形式特点的文艺也表示赞赏。他对马雅可夫斯基新型诗歌创作的支持在苏联文学史上传为佳话。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在本质上是鼓励和尊重文学艺术创作自由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史地宏观地把握和预期了世界文学的进程,预见了“世界文学”的远景。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代,文化的互相融合日益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在150多年前就已经预见了一种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高瞻远瞩地预言:“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页)虽然,“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是由德国大诗人歌德率先提出的,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这一宏大的文学命题的进一步论证与阐释,使这一命题具有更加充分而科学的论据。他们的结论是在全面考察了世界经济发展的现状和趋势的基础上,合乎世界经济和文化发展内在逻辑的一种精密推导。而20世纪末文化发展的现状正在印证他们的预见。在当代各国文学创作之间的互相借鉴、融合及渗透,就是鲜明的例证。当然,统一的世界文学,据笔者个人粗浅的理解,主要还是一种创作理念和手法的整合。“民族的和地方的片面性”逐渐被克服,但是民族文化的精华和特色仍将得到保留,而随着信息技术的推广,这些优秀的民族特色也就日益成为世界各国各族人民接受的文化成果。马克思所指的并不是民族和地方的全部特点,而是它们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因此,要全面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世界文学”的概念。所以,笔者比较赞同这样的文化理念:越是民族文化中优秀的,才是世界的。不宜笼统地认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辩证法在这里显得尤为重要。马克思对文学艺术把握宏大的历史观照和辩证的思维方法,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掌握。

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的经济结构和文化观念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剧变,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和文化本质的洞见、分析以及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世界社会和生产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趋势的预测在总体上依然具有颠扑不破的真理性。例如,近些年在西方滥觞并波及全世界经济的金融危机就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价值。当代在见证了马克思的英明预见之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人文学者发出了“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这样感佩而深沉的提问。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正确的,是对的,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是在吸收了人类文明的全部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又总是不断地结合当代的生产实践、科学创新和社会变革实践所得出的真理性的结论。重视吸纳人类文明的全部优秀成果,重视对世界文化经典现象的概括和评析,所以,马克思主义具有经典性;重视当代的生产实践、科学实验、社会实践和文化创造,所以,马克思主义又具有当代性,充满了现实实践的品格。马克思主义的这两个鲜明的特征同样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上。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之所以具有经典性,是因为这个科学理论全面总结了千百年来世界文学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之所以具有当代性,就在于它总是与关注现实社会发展的世界文艺进程同步发展的,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的文艺观念。因此,深入学习和进一步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念,努力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评价外国文学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仍然是时代与现实给我们提出的要求。研读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不仅仅是重温他们的经典,重要的是要学会和运用他们的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文学观与外国文学研究》这部文集就是力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解读经典的和当代的外国文学创作、文学流派及文学理论的学术研究成果。

吴晓都

2012年6月

目 录

一切文学都是当代文学

- 从马克思的“全球化”视野说起…………… 陈众议(1)

马克思的幽灵

- 评特雷·伊格尔顿新著《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 程 巍(21)

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及其提问方式…………… 党圣元(36)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四大家…………… 周启超(47)

略论列宁文艺思想的当代启迪意义…………… 吴晓都(66)

文学世界的营拟、尝试与认知

- 以歌德、马克思为中心的讨论…………… 叶 隽(78)

英国状况问题:卡莱尔、恩格斯与狄更斯…………… 乔修峰(93)

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刍议

- 以小林多喜二的代表作品《蟹工船》为中心…………… 魏大海(106)

当代俄罗斯文学发展的新趋势

- 从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观察…………… 侯玮红(122)

苏联解体 20 年再看文化因素

- 苏联解体 20 年反思…………… 董晓阳(133)

非同一性的乌托邦

- 试论阿多诺的文化理论诉求及其现实意义…………… 王 涛(140)

马克思主义文论在新中国…………… 冯宪光(162)

方法与思想:列宁论托尔斯泰…………… 侯 丹(173)

后记…………… (189)

一切文学都是当代文学

——从马克思的“全球化”视野说起

陈众议

曾几何时,作为罗马帝国消亡之后崛起的第一个“日不落帝国”,西班牙(包括神圣罗马帝国查理五世时期的葡萄牙及其殖民地、哈布斯堡王朝、西属美洲、意大利及亚非殖民地等)有恃无恐,在遏止英国崛起、新教蔓延的同时,展开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文化准备。于是,也便有了欧洲第一部中国史《中华大帝国史》和第一张世界地图。不仅如此,西班牙在派遣其驻菲律宾总督的同时,资助了一批又一批的传教士。这其中就有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阳玛诺等等。他们在传教和介绍西方文化的同时,系统考察我国国情,对我国的科举制度、宗教信仰、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等进行了全方位的了解,补充和完善了门多萨修士关于我国地大物博、重农轻商、尚文轻武、信鬼胜于敬神、追求安稳不尚冒险等诸多特征的描述。^①有鉴于此,不可一世的菲律宾总督德拉达、桑德等均曾上书国王,谓仅需几千兵马即可轻取中国。盖因在他们看来,中国固然强盛,却是一盘散沙。^②然而,帝国梦终究在英国和新教的夹击下无可奈何地幻灭了。然而的然而,19世纪中至20世纪的一百多年间,帝国主义对我中华民族的蹂躏多少印证了近现代中华民族的某些致命的阙如。

于是,光阴荏苒,时间流水般一晃过去了几个世纪。如今,跨国资本汹涌,中华民族面临更大,也更严峻的考验。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预见和描绘过跨国资本时代,谓“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③。如今,事实证明了马克思的预见,而且这个世界市场网的利益流向并不均等。

^① 冈萨雷斯·德·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孙家堃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9—70页。

^② 维利亚尔:《十六、十七世纪西班牙语世界在亚洲的扩张》,墨西哥城,文化经济基金会,1980年,第768—879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4页。

它主要表现为：所谓“全球化”，实质上是“美国化”或“西方化”，但主要是“美国化”；形式上则是跨国公司化。据有关方面统计，上世纪60年代以降，跨国资本市场逐渐擢升为世界第一市场。资本支配者迫不及待地开发金融产品，以至于千禧年前后世界货币市场的年交易额已经高达六百多万亿美国，是国际贸易总额的100倍；全球金融产品交易总额高达两千万亿美国，是全球年GDP总额的70倍。^①这是资本逻辑非理性的一次大暴露，其中的泡沫成分显而易见，利益驱动和目标流向更是不言而喻。此外，资本带来的不仅是利益，还有思想，即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凡此种种，已然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两难境地。逆之，意味着自杀；顺之，则必定被“化”。换句话说：伸脖子是一刀，缩脖子也是一刀。

一、“全球化”的跨国资本主义本质

有关“全球化”的讨论一直集中于时间和表象，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瓦特发明蒸汽机和叶利钦结束冷战时代等。我倾向于将全球化界定为跨国资本主义化，即资本在完成地区垄断和国家垄断之后实现的国际垄断。于是，资本之外一切皆无的时代已经来临，而坊间所谓的“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只不过是一种错觉或自欺欺人。

首先，经济作为一切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不可能实现独立的全球化进程。它必然具有政治属性，并导致相应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变迁（“信息高速公路”——互联网在此推波助澜）。如今，以资本为核心的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形成。富国如鱼得水，贫国大开血脉。资本所向披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所谓的“文化冲突”归根结底是利益冲突。如是，随着冷战的终结，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的结束，以及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多米诺骨牌式的所谓民主化浪潮的形成，资本逻辑和技术（工具）理性完成合谋。至此，“文化多元化”逐渐褪去面纱，露出真容；盖因在强大的资本面前，文化生态多样性的理想主义错觉全面崩塌。资本家可以四海为家；而无产者和广大浮游的中间人言路广开，却基本上只能是自话自说。

然而，正所谓有无相生，祸福相依，人类在创造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危机、更多的危险。凡事如此，概莫能外；各种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像钟摆，使世界莫衷一是。如此，“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跨国资本主义

^① 王建：“对当代资本主义全新形态的初步探索”，《文化纵横》，2008年第12期，第19页。

面临的新一轮危机也不仅是自身的问题,而且还有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反动。“9·11”事件便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更加极端的也许还在后面)。这就是说,跨国资本在发展中国家牟取巨额利润的同时,正通过低成本及相对廉价的产品和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资料形式冲击西方市场,导致西方国家危机频发,并在物质和精神双重层面上出现空前深刻的矛盾。

其次,资本无国界的事实导致了“地球村”的产生。它淡化了文化和意识形态冲突,利益冲突则日趋尖锐化、白热化。但利益冲突的主体已由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转向资本支配者,从而使民族国家意识逐渐淡化,直至完全淡出,取而代之以更为宽泛也更为具体的利益群体或个人。近来西方国家极右思潮的抬头多少与此相关:延绵两千年的犹太基督教文化在强大的资本逻辑面前毫无还手之力,一系列传统价值面临瓦解,致使极少数极端保守势力铤而走险。因此,“地球村”一定意义上也即“地雷村”。于是,“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人类面临空前危机:没有是非,只有强弱;没有善恶,只有成败;没有美丑,只有贫富(或冷热)。诸如此类的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界限模糊的情状以及“人权高于主权”之类的时鲜谬论只有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才能出现。但重要的是,诸如此类的时鲜谬论恰恰承载着跨国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

再次,“多元化”原本并不意味着文化平等。它仅仅是思想领域的一种狂欢景象,很容易让人麻痹,以为这世界真的已经自由甚至大同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元化”其实也是一个悖论,说穿了是跨国资本主义的一元化。而整个后现代主义针对传统二元论(如男与女、善与恶、是与非、美与丑、西方和东方等等)的解构风潮在否定简单二元论和排中律的同时夸大了李白杜甫各有所爱的相对性。于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这恰恰顺应了跨国资本的全球化扩张:不分你我,没有中心。于是,网络文化推波助澜,使世界在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和个人主义狂欢面前愈来愈莫衷一是、无所适从。于是,我们很难再用传统的方式界定文学、回答文学是什么这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借用昆德拉关于小说的说法,或可称当下的文学观是关乎自我的询问与回答,即甚嚣尘上的个人主义或个性化表演。盖因后现代主义留下的虚无状态显然不仅局限于形而上学范畴,其怀疑和解构本质明显具有悲观主义,甚至虚无主义倾向,并已然对世界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客观上造就了跨国资本主义时代“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及文学的“去民族化”态势。而这种状况对谁最有利呢?当然是跨国资本。

二、价值观是最大的软实力

核心价值观阙如的民族绝对不可能是强大的民族。然而,随着跨国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传统价值受到了冲击和解构,以至于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性与国家意识正在逝去,并将不复存在。认知方式、价值观和审美取向的趋同使年轻一代逐渐丧失了民族归属感和认同感,而四海为家、全球一村的感觉十分契合跨国公司不分你我、没有中心的去二元论思想。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曾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①

而民族虽然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但它归根结底只是个历史概念。犹太基督教思想将民族的发生和发展说成是上帝的安排,并使相关民族以“上帝的选民”自居。其他宗教也有类似的说法。即使是在达尔文进化论流行之后,基督教神学等也能自圆其说,谓适者生存只是一种表象,一切皆取决于上帝的意志,否则许多自然及人类演变的偶然性就无法解释。与之不同的是,人类学家摩尔根通过考察美洲印第安部落,对民族的产生作出了相对科学的解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将民族与私有制联系在一起,认为建立在氏族、部落、族群基础上的民族乃是私有制发展的需要,继而成为诸多国家的自然基础。由此看来,民族是一系列分化组合、再分化再组合的过程。而且历史使然,有生必有死,一旦私有制消亡了,随之不复存在的便是国家、民族、阶级等等。而种族虽然是个纯粹的生物学概念,却与民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为的宗教也是如此。因此,在极端的西方右翼思潮中,民族又常常是与种族和宗教观念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价值观的持守和重建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也是发达国家正在或将要面临的历史课题。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5页。

三、文学作为价值观的重要载体

人类藉人文以流传、创造和鼎新各种价值。文学作为人文明珠，其肌理决定了它作为民族认同的基础和文化基因或精神染色体的功用而存在并不断发展。因此，文学不仅是审美对象，而且是民族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这就牵涉到文学与民族之间那难分难解的亲缘关系。正因为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有人问及丘吉尔，莎士比亚和印度孰轻孰重时，他说如果非要他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那么他宁要莎士比亚，不要印度。

这是就一般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及其与文学的关系而言，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比如，中华民族及其民族认同感更多建立在乡土乡情之上。这显然与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方式有关。从最基本的经济基础看，中华民族是农业民族。中华民族故而历来崇尚“男耕女织”、“自力更生”。由此，相对稳定、自足的“桃花源”式小农经济和自足自给被绝大多数人当作理想境界。正因为如此，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么依恋故乡和土地。而农业民族往往依恋乡土，必定追求安定、不尚冒险。由此形成的安稳、和平的性格使中华民族大大有别于游牧民族和域外商人。反观我们的文学，最撩人心弦、动人心魄的莫过于思乡之作。“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等等。如是，从《诗经》开始，乡思乡愁连绵数千年而不绝，其精美程度无与伦比。当然，我们的传统不仅于此，经史子集和儒释道，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等等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这里既有六经注我，也有我注六经；既有人乎其内，也有出乎其外，三言两语断不能含括。然而，随着跨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对世界的一元化统治已属既成事实。传统意义上的故土乡情、家国道义等正在淡出我们的生活，麦当劳和肯德基，或者还有怪兽和僵尸、哈利波特和变形金刚正在成为全球孩童的共同记忆。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和审美取向正在令人绝望地全球趋同。与此同时，我们的文化取向也从重道轻器转向了重器轻道。四海为家、全球一村的感觉正在向我们逼近；城市一体化、乡村空心化趋势不可逆转。传统定义上的民族意识正在消亡。

认同感的消解或淡化将直接影响核心价值观的生存。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民族认同感或国家意识的淡化必将釜底抽薪，使资本逻

辑横行、拜金主义泛滥,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成为巴比伦塔之类的空中楼阁。因此,为擢升民族意识、保全民族在国家消亡之前立于不败并使其利益最大化,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使承载民族情感与价值、审美与认知的文学经典当代化。这既是优秀文学的经典化过程,也是温故知新、维系民族向心力的必由之路。于是,如何在跨国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传统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面临危机之际,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坚守和修缮我们的精神家园成为极其紧迫的课题。这其中既包括守护优秀的民族传统,也包括吸收一切优秀的世界文明成果,努力使美好的价值得以传承并焕发新的生命。

当然,这不是简单的一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可以迎刃而解。盖因时代有所偏侧,同时也取决于人类社会及人性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四、一切文学都是当代文学

克罗齐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同样,一切文学都是当代文学。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的“世界文学”,便是基于对跨国资本主义的认知。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了世界性的”,“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①因此,其概念完全不同于1827年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理想主义猜想。盖因在歌德那里,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并非建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基础之上,而是出于对《好逑传》或《萨恭达罗》之类的东方文学的激赏。在他看来,世界文学即各具特色的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并存与交融。这多少在费孝通先生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那儿产生了回音。但遗憾的是这种理想主义已然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市场化全球大众审美趋同中彻底瓦解。

人类的自然需求式生产方式早已被资本驱使下的时尚制造方式所取代。人为的摩登、挖空心思的创意在资本的驱动下不断翻新并制造利润,就连人类的自然繁衍方式也有可能为基因工程所迅速取代。传统(包括认知、价值观和审美方式)遭到了背弃。这不仅是诸君无谓地抢救“文化遗产”(包括早已被文明遗弃的巫巫傩傩或巫不巫傩不傩的劳什子)的理由,也是人们拼命强调国学(包括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学”潮和近二十年的“国学”热)的重要依据。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

然而,西风浩荡,人类文明的历史是取代性、颠覆性和不可逆性的。不仅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而且人性如此。一切悖逆只不过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如是,跨国资本主义正在使人类价值、审美乃至语言向资本支配者趋同。于是,人类文明的生态危机必然显形,而且已然显形。于是,尽可能地守护美好的民族传统不仅是出于文化生态多样性的需要,更是重情重义的君子之道、人文之道。盖因文学是加法,是不可再造的。套用阿瑞提的话说,如果没有哥伦布,总会有人发现美洲;没有伽利略,也总会有人发现太阳黑子;但若没了曹雪芹,又会有谁来创作《红楼梦》呢?这种不可替性和偶然性决定了文学作为民族文化基因或染色体的重要地位。当然,这并不是说只有传统的才是美好的,而是在于如何使传统获得升华与新生。瓦格纳的名言是“不要模仿任何人”。即使模仿也是为了创造的继承,而非简单复制(撒切尔夫人关于中国只产出商品、不输出思想的说法显然是指我们缺乏思想)。

但思想理论的形成并不能一蹴而就,文学理论亦然。当然,我们并非没有可能,更不应坐以待毙。除了探寻和把握事物规律,我们拥有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及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等极为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遗憾的是目前充斥我国文坛的恰恰是山寨版产品,以至于精神垃圾较之有毒食品、伪劣货物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学术伪命题及去心化现象比比皆是;文学语言简单化(却美其名曰“生活化”)、卡通化(却美其名曰“图文化”)、杂文化(却美其名曰“国际化”)、低俗化(却美其名曰“大众化”)等等,以及工具化、娱乐化等去审美化、去传统化趋势在网络文化的裹挟下势不可挡。凡此种种所承载或导致的价值混乱和认知错乱愈演愈烈。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然而,危机是全人类的。用古人的话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如今,诸多民族语言正像许多物种一样快速消亡。就连某些西方国家的知识精英也感到了来自资本主要支配者的话语压力。都德所谓“只要法语不亡,法兰西民族将永远存在”的著名论断有可能反转而成为箴言。强势的资本话语似黑洞化吸,正在饕餮般吞噬各弱小民族赖以存在的基础。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文学作为大到世界观、小至语言、风俗、情感等等的重要载体,正在消亡。其症候之一便是日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国际化”流行声色。

然而的然而: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真正的艺术规律亦非羚羊挂角无迹可寻。面对自我、时代和自然的抑欲与纵欲及其广阔的中游移状态,即物质与精神的共生与对立、互动和调和程度决定了人类文明的过

去、现在和未来。而文学经典每每藉当代化和理想化了的传统以抵抗物欲与时流。这看起来兴许有些保守,但综观世界文学经典,又有哪几种不是取法保守、取胜于保守的呢?这保守同时决定了经典的逆时性、共时性和超前性。正因为如此,文学经典虽然每每从现实出发,却不一定完全为时人所理解和接受,它们相当程度上指向或为了过去和未来。

以上只不过是历史—现实—未来和作家—作品—读者向度或坐标上的一种概说。因此,严肃的文学创作、文学研究必须尽可能地立足当代、放眼全球,同时又不忘记过去、心系未来,而不是趋前不顾后式的追逐与同欢,或一味地玩“空手道”,甚至闭门造车、钻牛角尖。盖因在跨国资本的全球化进程中,没有哪个民族能独善其身,况乎个人?但创造性地保守民族文化精髓本身便是与资本逻辑抗衡。

简言之,跨国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一环,即资本在完成地区垄断和国家垄断之后实现的国际垄断。它的出现不可避免。马克思正是在此认知上预言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分国别,不论民族,为了剥夺的剥夺,向着资本和资本家开战,进而实现人类大同——社会主义。但前提是疯狂的资本逻辑和技术理性让世界有那么一天(用甘地的话说,“世界足够养活全人类,却无法满足少数人的贪婪”);前提是我们必须否认“存在即合理”的命题,并且像马克思那样批判资本主义。这确乎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若不为,则意味着任由跨国资本毁灭家园、毁灭世界。

是的,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向马克思学习,在认清资本丑恶本质的基础上批判跨国资本主义,从而对诸如村上春树、纳瓦勒·赛阿达维、伊萨贝尔·阿连德等东方或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化作家以及我们的某些80后、90后作家,甚至知名作家的去传统化写作保持足够的警觉。由此推延,一切淡化意识形态或去政治化倾向(尽管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同庸俗社会学一样有害。在此,苏联解体之前的文学形态为我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前车之鉴,而苏联(特别是流亡)作家接二连三的诺贝尔奖同样意味深长。但是,更加意味深长的是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所遭受的各种挤压。这与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关系甚微。盖因利益才是当今世界发展与碰撞的深层机制和最大动力。

总之,利益决定关系。而全球资本的主要支配者所追求的利润、所奉行的逻辑、所遵从的价值和去民族化意识形态色彩,显然与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不可调和地构成了一对矛盾。如何从我出发,知己知彼,因势利导,为我所用地了解和借鉴世界文明成果,取利去弊、有持有舍、进退中度、创